

国际经济一体化对 巴西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王 胜 钱 青^{*}

摘要：本文采用了一种新方法来度量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该方法兼顾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全球经济自由化发展的综合影响。利用这个新指数，我们以巴西 1985 - 2006 年时间序列数据实证考察了国际经济一体化对巴西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一体化不仅具有较大的短期水平效应，而且还有一定的长期增长效应：如果巴西在 1985 年后没有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那么巴西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比现在减少 30 % 左右。

关键词：经济一体化 南方共同市场 水平效应 增长效应

一、前言

随着世界各国经贸交流的扩大，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飞速发展已经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特点。致力于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的 WTO 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在这种趋势下许多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也逐渐降低了对外关税水平；这样参与一体化组织的成员不仅会受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影响，同时还将感受到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作用。南方共同市场作为南美洲最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一方面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浪潮中不断地降低对外关税水平，另一方面又加快了区内成员国的相互合作和发展。从 1985 年提出建立南方共同市场，到 1995 年南方共同市场正式建立，再到 2006 年南方共同市场的第一次扩大（新增加了委内瑞拉为其正式成员国），南方共同市场的发展已经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取得了巨大成就，现在已经在外贸、金融、农业等各个领域进行了多方面的合作。

在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一体化对经济增长与居民福利的影响。理论研究表明经济一体化既有正面影响，又有负面效应。大部分研究认为参与经济一体化的国家可以通过相互交易商品、借贷资金、共享信息来加速经济增长；但是还有一些学者却认为这种增长作用也不是绝对的（Grossman and Helpman, 1997），尤其是南南合作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可能只会对规模较大的经济产生促进作用（Berthelon, 2004）。最近，关于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间成为新的理论研究热点。因此，加强对经济一体化增长效应的实证研究就成为理论发展和现实决策的迫切需要。当然，现有研究还主要集中于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研究，对发展中国家参与南南合作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增长效应研究还远远不够。本文选取了南方共同市场的主要成员国——巴西作为研究对象，来考察国际经济一体化对巴西经济增长的影响，这对评估中国参与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可能更有借鉴意义。

显然，对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准确度量是评估其经济效应的必要前提，但是传统的一些方法弱化了一体化实际进程和相关变量间的密切联系，这样就会对评估结果产生偏差，有的还可能得到一些相互矛盾的结论。本文借鉴了 Badinger (2005) 的新方法来度量经济一体化，该方法兼顾了南方共同市场和全球经济自由化进程

^{*} 王胜，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430072，电子信箱：shengwang522@yahoo.com.cn；钱青，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430072，电子信箱：qianqing821@yahoo.cn。

本文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一体化福利效应的比较研究”（06BG016）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际区域一体化比较研究”（05JJD790087）的资助。

对巴西经济发展的综合影响,这样我们就在标准的增长理论框架下检验国际经济一体化对巴西经济增长的各种效应。本文以巴西 1985 - 2006 年时间序列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考察了国际经济一体化对巴西经济增长的短期水平效应和长期增长效应,最后根据计量结果定量分析了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对巴西人均 GDP 的影响。

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介绍了基本理论分析框架和实证模型;第三部分具体说明了对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度量;第四部分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一部分给出本文的主要结论和需要改进的地方。

二、理论框架

目前有关经济效应的研究分歧主要集中于一体化是否具有短期水平效应或长期增长效应,还是两者兼有。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一体化只有短期水平效应,而内生增长理论则认为一体化兼有水平效应和增长效应。但是 Young(1998)在没有规模效应的内生增长模型中发现一体化对总产出仅仅具有短期水平效应。

在研究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下,经济一体化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和渠道来促进经济增长。Grossman 和 Helpman(1997)主要强调了研发这种传导渠道,指出一体化可以通过促进知识传播、扩大新商品市场等方式影响成员国的经济增长。Rivera - Batiz 和 Romer(1991)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分析一体化经济效应的标准模型,发现一体化水平效应和增长效应的重要程度主要取决于知识在不同国家之间的传播方式。Devereux 和 Lapham(1994)则指出这个结论依赖于成员国经济相互对称这个严格的假设,因此缺乏稳健性。Kutan 和 Yigit(2007)做了进一步发展,强调了一体化过程中制度安排的重要性,而且此时兼有水平效应和增长效应。总而言之,大部分研究都强调了一体化促进经济增长的两种传导机制,即技术和投资。

为了给实证分析提供一个理论框架,这里采用最简单的 Cobb - Douglas 生产函数 $Y = AK^{\alpha}L^{1-\alpha}$,其中 Y 为产出, K 和 L 分别为资本和劳动, A 为技术水平,系数 α 和 $1 - \alpha$ 分别代表产出对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将生产函数两边除以劳动数量,然后进行对数差分处理即可得到:

$$\Delta \ln y_t = \Delta \ln A_t + \alpha \Delta \ln k_t \quad (1)$$

其中 $y = Y/L$, $k = K/L$ 。通过这个简单方程,我们不难发现技术和资本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两种主要途径。Baldwin 和 Seghezza(1996b)把这两种影响分别定义为技术拉动型增长效应和投资拉动型增长效应。

Grossman 和 Helpman(1997)、Rivera - Batiz 和 Romer(1991)、Romer(1990)等强调了第一种传导效应,他们认为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增长主要源于以下几种原因:国际市场加大了技术溢出效应、研发部门的规模效应,对技术革新更高的利润激励,减少了国家间研发投入的重复建设。Coe 和 Helpman(1995)实证研究发现一国的全要素生产力不仅取决于该国的研发水平,而且还会受到其贸易伙伴研发水平的影响;经济一体化通过加快国际技术溢出效应,使本国能够分享外国技术进步的好处。

我们以 INT_t 来代表 t 时刻一国参与经济一体化的程度,技术拉动型增长效应可以表示成下面的简单形式:

$$\Delta \ln A_t = \gamma_{A0} + \gamma_{A1} \Delta INT_t \quad (2)$$

其中 γ_{A0} 表示技术进步的外生部分。(2) 式假定一体化只有短期水平效应,这正如新古典增长理论指出的,静态均衡的增长率只取决于外生的技术进步率。此外,一体化的长期增长效应也要有所考虑,具体表示如下:

$$\Delta \ln A_t = \gamma_{A0}^p + \gamma_{A1}^p INT_t \quad (3)$$

一体化的长期增长效应主要源于内生增长理论的规模效应。Romer(1990)在假定规模收益不变的前提下发现大国增长得更快一些,简而言之,一体化过程被看成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的过程,从而导致更快的均衡增长。因为巴西在南方共同市场中经济规模最大,所以本文综合考虑一体化对巴西经济的水平效应和增长效应。

许多理论研究认为,投资是联系贸易和增长的更重要渠道。Balassa(1961)对于这种由投资拉动的增长效应给出了一些直觉性解释,他强调经济一体化在减少投资风险、降低资本成本、营造有利的企业经营环境等方面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Levine 和 Renelt(1992)、Baldwin 和 Seghezza(1996a)、Wacziarg(2001)都认为一体化主要通过刺激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

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由投资拉动的经济效应同样也是短期的,所以一体化的投资拉动型短期水平效应可以表示为:

$$\Delta \ln k_t = Y_{k0} + Y_{k1} \Delta INT_t \tag{4}$$

经典的 AK 模型作为内生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主要特点就是产出对资本规模收益不变,从而阐明了具有长期投资拉动型增长效应的机制。现在许多证据表明一体化的投资拉动型效应仅仅具有水平效应,但是其长期增长效应的假定同样可以通过以 INT_t 代替 ΔINT_t 进行实证检验。

通过前面的分析和推导,我们可以得到一体化对总产出的总体短期水平效应:

$$\Delta \ln y_t = Y_0 + Y_1 \Delta INT_t \tag{5}$$

其中 $Y_0 = Y_{A0} + \alpha Y_{k0}$, 并且 $Y_1 = Y_{A1} + \alpha Y_{k1}$ 。同理,长期增长效应则可以通过(6)式进行检验:

$$\Delta \ln y_t = Y_0^p + Y_1^p INT_t \tag{6}$$

三、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度量

虽然对一体化程度的正确度量是评估其效应的必要前提,但是对于一体化变量的选择和度量还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Ben - David(2001)认为缺乏对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正确度量将导致分析结果出现偏误。这种偏误在早期对欧洲一体化增长效应分析中经常出现,当时主要采用的是比较简单的一些经济一体化变量:例如以 1 - 0 虚拟变量来简单反映欧盟成员国地位和参加一体化的时间(Landau,1995;Henrekson et al. , 1997)。显然,如此简单的度量方法难以囊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盟 15 国经济一体化组织建立和发展的特点;同理,这些方法也同样不能充分反应巴西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特点。

首先,经济一体化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其特点不是仅仅通过 1 - 0 这种离散变化的虚拟变量所能充分反映的。如表 1 所示,早在 1985 年巴西就和阿根廷提出了建立南方共同市场的想法,并且得到了乌拉圭和巴拉圭的响应;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直到 1991 年巴西等 4 国才签署了《亚松森条约》,制定了具体的减税计划;到了 1995 年,南方共同市场才正式运行,关税同盟成立。

表 1 巴西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主要进程

南方共同市场一体化	GATT 贸易自由化
1985 年:巴西和阿根廷提出建立南方共同市场 1987 年:巴西开始全面的贸易自由化改革 实施:1987 - 1992 年,其非加权平均关税从 51 %降至 21 %。 1991 年:巴西等 4 国签署了《亚松森条约》 实施:1991 年至 1994 年 6 月 30 日期间,成员国以每半年减低 7 个百分点的速度将区内关税降为零。 1995 年:南方共同市场关税联盟生效 实施:对 85 %的进口商品实行税率为 0 ~ 20 %的统一对外关税。 1996 - 2006 年:南方共同市场的发展 实施:南方共同市场先后接纳智利(1996 年 10 月)、玻利维亚(1997 年)、秘鲁(2003 年)、委内瑞拉(2004 年 12 月)、厄瓜多尔(2004 年 12 月)和哥伦比亚(2004 年 12 月)6 国为其联系成员国。 2006 年:南方共同市场批准委内瑞拉为正式成员国	1986 - 1994:乌拉圭回合 发展中成员总体关税的平均减让幅度在 24 %左右。

其次,以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扩张来衡量巴西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误导。虽然自从南方共同市场正式运行后,其影响越来越大,先后接纳智利(1996 年)、玻利维亚(1997 年)、秘鲁(2003 年)、委内瑞拉(2004 年)、厄瓜多尔(2004 年)和哥伦比亚(2004 年)6 国为其联系成员国;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也出现过经济自由化倒退的现象。如 1997 年底南方共同市场决定,从 1997 年 12 月 1 日起至 2000 年 12 月 31 日止,将共同对外关税提高 3 个百分点(乌拉圭、巴拉圭暂不实施)。

最后,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不仅受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动,而且还受到在 WTO 框架下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影响。在 GATT 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影响下,巴西在 1987 年开始全面的贸易自由化改革,政府把改革措施看成是一个开创自由化、简单化和非官僚主义化的进程。1987 - 1992 年其非加权平均关税从 51 %降至 21 %,并且单项货物最高税率从 105 %降至 65 %。

为了更准确地考察经济一体化对巴西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本文在 Badinger(2005)度量方法的基础上,

进行了一些改进。首先,由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南南合作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就可能对成员国产生不对称的影响,所以本文没有像 Badinger 一样把整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而是单独把巴西一个国家作为分析的对象。其次,在构建一体化指数的过程中,本文还考虑了南方共同市场新增联系国对巴西交易成本的影响。

对一国经济壁垒程度 (PROT) 的衡量成为构造一体化指数的基础,其表示形式如下:

$$PROT_{i,t} = T_{i,t} + TC_{i,t} = \sum_{j=1}^J w_{ij,t} (t_{ij,t} + tc_{ij,t})$$

它反映了关税水平 $t_{ij,t}$ 和贸易成本 $tc_{ij,t}$ 的加权平均和,权重 $w_{ij,t}$ 为 i 国与 j 国的贸易量在 i 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例。如果这些国家是对称的,那么加权平均的关税水平 $T_{i,t}$ 还反映其他国家对 i 国的壁垒程度,同时加权的交易成本 $TC_{i,t}$ 也反映了 i 国企业的平均贸易成本。如果自由化能够采用互惠的形式,那么每个国家保护程度的变化就应该表现出高度的相关性。在这种情况下,壁垒指数 (PROT) 虽然反映了 i 国对其他国家的壁垒程度,但是同样可以成为度量 i 国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标准。

接下来我们考虑加权平均的关税水平。虽然缺少巴西对外关税的完整时间序列数据,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其他渠道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例如, GATT 中的乌拉圭回合的相关协定,南方共同市场在其建立和扩展过程中的一系列措施,以及《世界发展指标》上的各期数据。

为了量化南方共同市场内部互惠的经济效应,我们采用加权的交易成本来衡量。利用 Smith 和 Venables (1988) 的方法,我们假定关税同盟的建立降低了一体化组织内部的贸易成本,其中贸易成本相当于 2.5 % 的关税水平。此外,随着南方共同市场联系成员国的加入和增多,也将进一步降低巴西和这些国家的交易成本。为了计算方便,我们假定每一个联系成员国的加入,都相当于巴西降低了 1 % 的关税水平。

我们以壁垒指数相对下降程度来反映巴西参与一体化的程度。因为选取的时间序列数据起点是 1985 年,所以就可以把 t 期巴西的一体化指数 ($INT_{i,t}$) 表示成下面的形式:

$$INT_{i,t} = \frac{PROT_{i,1985} - PROT_{i,t}}{PROT_{i,1985}}$$

除了前面提到的原因外,这种度量方法还有更多的优点。首先,它弱化了初期关税水平的不确定性,以关税的相对下降来代替其绝对变化,更具合理性;其次,一体化指数可以从 0 (完全经济独立) 变化到 1 (完全的经济一体化),从而使这个变量更贴近于 Young (1998) 的理论模型。图 1 显示了 1985 - 2006 年巴西的一体化指数变化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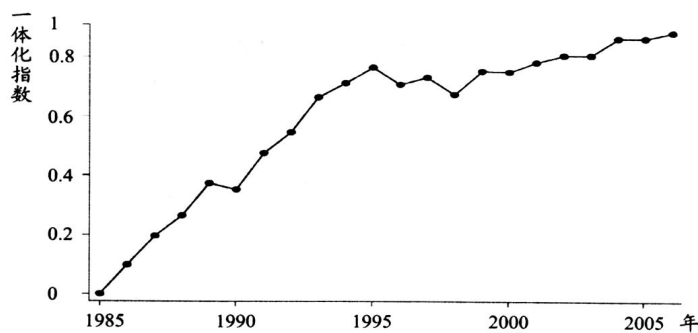


图 1 一体化指数的时间序列图

当然,这种度量一体化程度的方法也并非尽善尽美。对于交易成本的折算过于主观,而且还忽略了非关税壁垒的变化,其主要原因在于缺少这方面的有效数据。此外,我们使用的是加权平均关税水平,这就和一体化进程中减免的平均关税存在一定的偏差。虽然本文对一体化程度的度量还存在上述种种问题,但是相对于简单的虚拟变量或者贸易份额等数据,一体化指数还是能够更准确地刻画巴西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从而为我们的实证分析提供一个更加符合现实状况的指标。

四、数据说明和实证检验

这里我们采用巴西 1985 - 2006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表 2 给出了用于实证检验的经济变量及其相关说明。

表 2 实证分析中有关变量的说明

变量	说明	单位	数据来源
$\Delta \ln y_t$	人均实际 GDP(Y/L)的年增长率; Y = 以 1995 年市场价格得到的实际 GDP, L = 估计的年均人口数量。	%	EIU Country Data
$\Delta \ln k_t$	人均资本(K/L)的年增长率; K = 以不变价格衡量的实际资本存量, 下面的方法计算得到: $K_t = (1 - d) K_{t-1} + I_t$, 其中 I_t 为以 2005 年价格衡量的实际固定总投资, d = 折旧率, 初始资本存量水平: $K_{1985} = I_{1985} / (g_{1980-1990} + g_{1980-1990})$ 为 1980 - 1990 年投资的平均增长率。	%	EIU Country Data
ΔINT_t	一体化程度的变动值 = $INT_t - INT_{t-1}$, 其中 INT_t 为第 t 期巴西的一体化水平。	%	根据前面的方法计算得到
π_t	通货膨胀: 巴西 GDP 平减指数的年增长率。	%	EIU Country Data
$OPEN_t$	经济开放度: 实际进出口总额对实际 GDP 的权重。	%	EIU Country Data

说明: $t = 1986, \dots, 2006$ 。

根据前面介绍的方法,表 3 给出了具体的实证分析结果。其中(a)列是对(5)式和(6)式的一个综合性的 OLS 估计,考察了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水平效应和长期增长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巴西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对其经济发展存在着一定的长期增长效应。这种效应虽然在统计意义上具有较强的显著性,但是程度并不显著,一体化绝对水平每上升 1 %,巴西经济就会出现大约 0.04 %的增长。相对而言,一体化指数的变动则表现出相当明显的经济效应,这就说明国际经济一体化具有相当显著的短期水平效应,一体化变动程度每增加 1 %,巴西经济增长就会加快 0.25 %。

表 3 巴西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实证分析结果

被解释变量: $\Delta \ln y_t$						
	(a)	(b)	(c)	(d)	(e)	(f)
常数项	- 0.0028	- 0.0173	0.0080	0.0312	- 0.0110	- 0.0086
INT_t	0.0382 * (1.68)	0.0610 *** (3.30)	0.0545 * (1.72)		0.0534 *** (3.49)	0.0503 *** (3.29)
ΔINT_t	0.2493 ** (2.49)	0.3227 *** (4.08)	0.3247 *** (3.28)		0.2476 *** (3.60)	0.2180 *** (3.33)
$\Delta \ln k_t$				0.1001 *** (3.43)	0.0718 *** (3.10)	0.1001 (Imposed)
$\Delta OPEN_t$		- 0.1321 *** (- 3.70)	- 0.1340 *** (- 3.87)	- 0.0729 * (- 1.98)	- 0.1170 *** (- 3.96)	- 0.1111 *** (- 3.76)
π_t			- 6.92e - 06 (- 0.69)			
$\ln y_{t-1}$			- 0.0020 (0.13)			
R^2	0.2686	0.5945	0.6515	0.5467	0.7467	0.5600
调整的 R^2	0.1874	0.5230	0.5353	0.5228	0.6834	0.4823
F	3.31	8.31	5.61	22.92	11.79	7.21

说明: 每个系数估计值下面括号中数值为 t 统计值,所有的模型都是采用的 OLS 估计方法; *、**和 *** 分别表示 10 %、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

当然,还需要考察实证结论的稳定性。正如 Levine 和 Renelt (1992) 所提到的,加入更多的解释变量对考察实证模型结论的稳定性相当重要。对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中,经济开放度、通货膨胀和 GDP 一期滞后变量等许多因素都将影响经济增长速度,所以我们也加入这三个解释变量。首先,我们增加了贸易份额($OPEN$)的变动,以此作为经济开放度的指标。其次,因为 Henrekson 等(1997)在对欧盟进行实证研究中,发现当加入通货膨胀时,代表一体化程度的虚拟变量就变得不显著了,所以我们还加入了通货膨胀。再次,一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惯性,因此我们加入巴西人均产出的初始水平($\ln y_{t-1}$)来检验实证结论的稳定性。在(b)列中,我们发现经济开放度对巴西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但是其系数为负。在(c)列中同时加入三个新解释变量,也只有经济开放度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其影响系数也是负的,影响程度没有出现明显改变。一般而言,随着经济开放度的加深,一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就越快。但是巴西经济开放度对其经济增长却是负面影响。通过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巴西进口增长要快于出口增长,所以其经济开放度主要反映进口变动趋势,而进口增加将抑制巴西国内产出增长。

综上所述,在没有考虑资本积累的情况下,(b)列给出了最适合的实证模型;接着我们加入资本积累来分析促进巴西经济增长的各种传导机制的相对重要性。因为缺乏显著而稳健的人力资本变量数据,所以只分

析物质资本的作用。Levine 和 Renelt (1992) 发现一旦控制投资,经济增长和一国经济开放度就没有稳定的相关关系,因此在我们的实证分析中考察是否存在技术拉动型效应就显得十分有意思。

(d) 列给出了只包含资本变动和经济开放度的实证结果,资本变动表现出高度显著性,资本产出弹性为 0.1 左右;经济开放度系数依然为负数,而且显著性也较高。在此基础上加入一体化指数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正如期望的一样,(e) 列中 INT_t 和 ΔINT_t 的系数相对于 (b) 列的结果出现了明显下降,这就表明一体化的投资拉动型增长在巴西经济增长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为了消除资本变动的内生性,可以采用两阶段估计,但是那将造成计量样本个数的减少。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我们借鉴 Badinger (2005) 的方法,根据 (d) 列得到的资本产出弹性来固定资本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这种限制性回归估计的结果见 (f) 列,虽然由此得到的 INT_t 和 ΔINT_t 的系数相对于无限制估计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但是仍然具有很高的统计显著性。

把 (d) 列、(f) 列和没有包含资本变动的 (b) 列结果进行对比,可以得到以下结论:投资拉动型和技术拉动型效应在一体化短期水平效应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投资拉动型增长的相对贡献程度大约为 23 % ~ 33 %;在长期增长效应中,技术拉动型增长承担了绝大部分传导功能,投资拉动的贡献程度只有 13 % ~ 18 %。这里投资拉动型增长的相对贡献程度是通过在 (b) 列得到的总效应中剔出技术拉动型增长效应后计算出来的。

当然我们还可以通过直接估计 (4) 式得到投资拉动型的影响,然后利用 (d) 列估计的资本份额估算出资本变动对产出的贡献程度。表 4 给出了一体化指数对资本变动影响的估计值,通过计算可以得到投资拉动型增长在总效应中的贡献程度为 20 % 和 24 %,这个结论和前面的估计基本一致。虽然这种估计方法的显著性不强,但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从另一个角度验证前面实证结果的稳定性。

表 4 巴西投资拉动型增长效应的评估

被解释变量: $\Delta \ln k_t$		
	(a)	(b)
常数		- 0.0147
ΔINT_t	0.6536 * (1.52)	0.7909 * (1.40)
R^2	0.1034	0.0938
调整的 R^2	0.0586	0.0461
F	2.31	1.97

说明: * 表示 15 % 的显著性水平。

根据上面实证检验得到的结果,我们还对巴西参与一体化的经济效应进行了数值模拟。为了量化经济一体化中的长期增长效应和短期水平效应,我们主要利用表 3 中 (b) 列回归方程的结果。虽然在回归方程中得到的增长效应比较小,影响系数只有 0.06 左右,不到短期水平效应(影响系数为 0.3227)的 1/5,但是通过长期的积累就会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明显作用。为了更直观地对比水平效应和增长效应,我们假定巴西在 1987 年开始全面贸易自由化改革时,其参与一体化的增长效应才开始出现,同时假定增长效应一直保持不变。这样在 1985 年后,如果巴西没有参与任何形式的经济一体化,就可以得到表 5 的数值模拟结果。

因为假定一体化的增长效应在 1987 年才出现,所以表 5 中给出了 1987 - 2006 年的数据。(b) 列是假设没有一体化时巴西人均实际 GDP 水平,对比 (a) 列,我们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体化对巴西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参与一体化的初期(1987 年),一体化对巴西人均产出的总效应只相当于人均总产出的 7 % 左右,但是到了 2006 年这个比例就达到了 30 %,也就是说如果巴西没有参与近 20 年的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现在其人均 GDP 可能会减少 30 % 以上。(c) 列和 (e) 列是对一体化的经济效应进行分解,分别单独考察没有增长效应和水平效应的情况;(d) 列和 (f) 列则给出了两种效应在一体化总效应中所占的比重。如果没有增长效应,巴西 1987 年的人均 GDP 只会从 5 252 美元降到 5 195.08 美元;但是如果没有水平效应,人均 GDP 将降到 4 942.86 美元。由此可见,在参与一体化的初期,水平效应更加明显。到了 2006 年,我们就会发现两种效应对巴西经济的影响程度就差不多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体化的长期增长效应越来越重要。

本文是首次用这种新方法来分析巴西参与一体化的经济效应,但是本文的结论和相关研究成果基本一致。例如 Henrekson (1997) 对欧洲一体化的研究,他们采用虚拟变量的方法发现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率存在大约 0.6 % ~ 1.3 % 的长期影响,而 Badinger (2005) 则发现欧洲经济一体化的长期增长效应并不明显,但是短期水平却高达 27.7 %。Greenaway 等 (1998) 利用面板数据对 73 个国家的贸易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研

究,而且其中大部分国家是发展中国家,最后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虽然各个国家的开放程度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开放程度普遍存在着 46 %的水平效应。本文考察的也是发展中国家,得到了比较显著的一体化水平效应,这类似于 Greenaway 等的研究;同时一体化对巴西还有一定的长期增长效应,这又和 Henrekson 对欧洲的研究结论一致。

表 5 巴西参与经济一体化的增长效应和水平效应						
时间	人均实际 GDP	无一体化时的人均实际 GDP	无增长效应的人均实际 GDP	增长效应占一体化总效应的比例	无水平效应的人均实际 GDP	水平效应占一体化总效应的比例
	(a)	(b)	(c)	(d)	(e)	(f)
1987	5 252.00	4 885.95	5 195.08	0.16	4 942.86	0.84
1988	5 333.90	4 797.34	5 219.38	0.21	4 911.86	0.79
1989	5 554.30	4 773.52	5 381.49	0.22	4 946.33	0.78
1990	5 403.30	4 600.57	5 171.49	0.29	4 832.37	0.71
1991	5 546.10	4 467.98	5 254.59	0.27	4 759.49	0.73
1992	5 534.00	4 268.28	5 182.07	0.28	4 620.21	0.72
1993	5 877.30	4 328.23	5 464.22	0.27	4 741.32	0.73
1994	6 207.30	4 506.55	5 732.33	0.28	4 981.51	0.72
1995	6 491.90	4 625.85	5 954.31	0.29	5 163.44	0.71
1996	6 690.90	4 871.67	6 089.93	0.33	5 472.65	0.67
1997	6 952.30	5 023.57	6 287.18	0.34	5 688.69	0.66
1998	6 954.80	5 073.90	6 224.76	0.39	5 803.94	0.61
1999	7 091.90	4 994.49	6 296.17	0.38	5 790.23	0.62
2000	7 410.70	5 250.62	6 548.48	0.40	6 112.84	0.60
2001	7 640.00	5 351.27	6 710.49	0.41	6 280.78	0.59
2002	7 810.00	5 406.75	6 812.40	0.42	6 404.35	0.58
2003	7 850.00	5 377.83	6 783.48	0.43	6 444.34	0.57
2004	8 300.00	5 644.41	7 163.74	0.43	6 780.67	0.57
2005	8 700.00	5 973.83	7 493.16	0.44	7 180.67	0.56
2006	9 170.00	6 332.71	7 891.73	0.45	7 610.98	0.55

说明:(a)列、(b)列、(c)列和(e)列都是以购买力平价衡量的人均实际 GDP,单位为美元。

此外,本文对一体化投资拉动型和技术拉动型两种传导机制的研究结论也和其他相关研究类似。Frankel 和 Romer(1999)在研究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中,发现贸易的增长效应有 2/3 是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的,其他 1/3 是通过资本积累实现的,Wacziarg(2001)采用联立方程组模型发现 63 %的效应是由投资拉动的,22.5 %是由技术拉动的,其他的则是源于政府的宏观稳定政策。本文结论进一步验证了这种观点:资本积累和技术提高是一体化促进经济增长的两种重要传导渠道。

五、结论

本文在借鉴新度量方法的基础上对巴西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经济效应进行了考察,综合考虑了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巴西经济增长的共同影响。本文结论验证了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部分思想,发现巴西在参与一体化的过程中,同时存在明显的短期水平效应和长期增长效应。如果自 1985 年后巴西没有参与一体化进程,那么现在巴西人均实际 GDP 就会减少近 1/3,并且一体化的长期增长效应接近于短期水平效应。我们还发现,一体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联系起来的。虽然在传导机制的分解中,我们发现大约 1/4 ~ 1/3 的总效应是由投资拉动的,但是并没有明确验证技术拉动的具体传导路径,这一点还有待于进一步实证分析。

本文深入分析了巴西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经济效应,得到了类似于对美欧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结论。但是由于对巴西的相关研究还不太多,所以本文的结论有待于进一步验证。此外,本文的实证方法还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扩展,例如考虑加入宏观政府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Temple,2003),还可以把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其经济增长效应(Badinger,2005)。

参考文献:

1. Badinger, Harald, 2005. " Growth Effect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Evidence from the EU Member States. "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Vol. 141, pp. 50 - 78.

2. Balassa, B., 1961. The Theory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London: Allen & Unwin.

3. Baldwin, R. E. and Seghezza, E., 1996a. " Trade - induced Investment - led Growth. " NBER Working Paper, No. 5582.

4. Baldwin, R. E. and Seghezza, E., 1996b. "Growth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Towards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 1393.
5. Ben - David, D., 2001.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Income Convergence: A Com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55, pp. 229 - 234.
6. Berthelon, Matías, 2004. "Growth Effect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Agreements." Central Bank of Chile Working Paper, No. 278.
7. Coe, D. T. and Helpman, E., 1995. "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39, pp. 859 - 887.
8. Devereux, M. and Lapham, B., 1994. "The Stability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Endogenous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9, pp. 299 - 305.
9. Frankel, J. A. and Romer, D., 1999. "Does Trade Cause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9, pp. 379 - 399.
10. Greenaway, D.; Morgan, W. and Wright, P., 1998. "Trade Reform, Adjustment and Growth: What Does the Evidence Tell Us." *Economic Journal*, Vol. 108, pp. 1547 - 1561.
11. Grossman, G. M. and Helpman, E., 1997. *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MIT Press.
12. Henrekson, M.; Torstensson, J. and Torstensson, R., 1997. "Growth Effect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41, pp. 1537 - 1557.
13. Kutan, Ali M. and Yigit, Taner M., 2007. "European Integration,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Real Convergence."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51, pp. 1370 - 1395.
14. Landau, D., 1995.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European Common Market to the Growth of Its Member Countries: An Empirical Test."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Vol. 131, pp. 774 - 782.
15. Levine, R. and Renelt, D., 1992. "A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Cross Country Growth Regress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2, pp. 942 - 961.
16. Rivera - Batiz, L. and Romer, P., 1991.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Endogenous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6, pp. 531 - 555.
17. Romer, P. M., 1990.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8, pp. 71 - 102.
18. Smith, A. and Venables, A. J., 1988. "Completing the Internal Market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Some Industry Simulation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32, pp. 1501 - 1525.
19. Temple, J., 2003. "The Long - run Implications of Growth Theo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Vol. 17, pp. 497 - 510.
20. Wacziarg, R., 2001. "Measuring the Dynamic Gains from Trad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 15, pp. 393 - 429.
21. Young, A., 1998. "Growth without Scale Effec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6, pp. 41 - 63.

(责任编辑:刘成奎)

(上接第 98 页)

12. Bonin, J. and Wachtel, P., 2005. "Privatization Matters: Bank Efficiency in Transition Countries."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Vol. 29, pp. 2155 - 2178.
13. Hasan, I., 2005. "Ownership, Governance, and Bank Performance: Korean Experience." *Financial Markets, Institutions & Instruments*, Vol. 4, pp. 2130 - 2143.
14. Clarke, R. and Shirley, M., 2005. "Bank Privat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Summary of Lessons and Findings."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Vol. 29, pp. 1905 - 1930.
15. Clarke, R., 2005.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Impact of Bank Privatization and Foreign Entry on Access to Credit in Argentina's Provinces."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Vol. 29, pp. 5 - 29.
16. Claessens, S. and Huizinga, H., 2001. "How Does Foreign Entry Affect Domestic Banking Markets?"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Vol. 25, pp. 891 - 911.
17. Claessens, S. and Gaessner, T., 1998.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Financial Services in Asia."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1911.
18. Demsetz, H., 1983. "The Structure of Ownership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Vol. 1, pp. 116 - 129.
19. Domanski, D., 2005. "Foreign Banks in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Changing Players, Changing Issues." *BIS Quarterly Review*, Vol. 1, pp. 69 - 81.
20. Haber, S., 2005. "Mexico's Experiments with Bank Privatization and Liberalization, 1991 - 2003."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Vol. 29, pp. 2325 - 2353.
21. Jensen, M. and Meckling, W., 1976. "Theory of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 3(4), pp. 128 - 143.
22. Levine, R., 1996. "Foreign Bank,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E. B. Claud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and AEI Press.
23. Morck, R. and Vishny, R., 1998. "Management Ownership and Market Valua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 20(2), pp. 293 - 315.
24. Patti, B. and Hardy, C., 2005. "Financial Sector Liberalization, Bank Privatization, and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Pakistan."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Vol. 29, pp. 2381 - 2406.
25. Goldberg and Daniel, K., 2000. "Foreign and Domestic Bank Participation in Emerging Markets: Lessons from Mexico and Argentina." NBER Working Paper No. 7714.
26. Unite, A. and Sullivan, M., 2003. "The Effect of Foreign Entry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on the Philippine Domestic Banking Market."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Vol. 27, pp. 2323 - 2345.

(责任编辑:王红霞)